

李印堂 / 著

追求与跋涉

编辑手记

贵州教育出版社

追求与跋涉

杨国平记

李锐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追求与跋涉

——编辑手记

李印堂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邦蜀
封面设计 张 彪
技术设计 田亚民

追求与跋涉

——编辑手记

李印堂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州商业专科学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字数 10.875 印张 270 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次印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014-6/G·12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盐务街 35 号 电话:6823041 邮编:550004

代序一：编辑岁月回顾



1974年，当我从原艺术专科学校调到省群众艺术馆，走进《贵州演唱》编辑部，我知道自己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本来，我是喜欢教书的，在大学时期就有过这种愿望。可是，在艺校和京剧班的那些小男孩小女孩打交道，给他们上文化课，实在不符合我的性格。老实讲，我更希望和青年人打交道。所以，一听说省群众艺术馆需要编辑，我马上就动心了。

省群众艺术馆是个辅导群众文艺活动的部门。而《贵州演唱》编辑部的职责则是辅导群众的文艺创作活动，将全省各专州县业余作者创作的诗歌、戏剧、说唱等作品择优发表。

也许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这块牌子有点分量，也许是我在贵州近十年混得还马马虎虎，因此，调动几乎没费什么周折。

《贵州演唱》编辑部原有6位编辑，其中5个是老同志。我当时已年过35岁，到编辑部还算是最年轻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科班出身学戏剧专业的五年制本科生。不过，我当时还是知道山高水深路难行的道理的。更何况早在省文化局时，就听那些所谓左派经常提到艺术馆几个“有问题的人”，什么钟华呀，关太平呀，等等。也许是王蒙、刘宾雁、陆文夫这些人的作品在学生时代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被打成右派，成了“有问题的人”以后，

使我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文艺界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多半是有才华的人。因此，在那极左思潮和唯成分论影响每个人的前途命运的年代，我一点也不嫌弃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即使和他们一起为伍，只要他们有真才实学，人品好，我仍然会和他们交朋友。

事实上，也恰如我想象的那样。他们完全不同于文化局那些吃政治饭的官员。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优越感，更不唱那些假大空的高调。相反，他们对社会问题却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看法。钟华先生 50 年代是位有才华的部队诗人，1957 年被错划成右派，在劳改农场受了不少磨难。摘帽子后安排到艺术馆，抓业余诗歌创作。政治上的打击和生活上的磨难，并没有使他丧失锐气。谈起话来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当我们成了好朋友以后，谈到文革中打电话第一句必须先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当年希特勒第三帝国就是这种搞法。这在当时，是犯杀头之罪的言论。说明他一方面信任我，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量。

关太平先生的性格和钟华就不一样了。他一付落魄的样子，个性的棱角与思想的锋芒好像已被多灾多难的岁月磨光，变得几乎与世无争。偶尔和人争论起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激情与正义感才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来。据说他在上饶集中营坐过国民党的牢，至于有什么“问题”，我不得而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年，他下乡搞“四清”运动。有次工作队长要给四类分子训话，要他先摸摸底，看有多少地主，多少富农，多少反革命等，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如何。他询问到一个老实巴交的四类分子，一问情况，发现是个假的。原来此人土改时划为贫农，抗美援朝时期，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当地根据农民捐的款数多少，分成四类。这位农民当时款捐得少，被划到四类里边。从此，凡四类分子开会出义务工，他都老老实实参加……

“就这样，十多年，你说荒唐不荒唐？！”关先生一脸哭不出也

笑不出的神情。

在老编辑中，只有屈杰先生谨言慎行，闭口不谈政治，不谈社会问题，只谈剧本创作。他处世老练，对一切似乎均已看透。他原是出版社的编辑，不知何故调到艺术馆。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时，他又回到出版社。但不久，他便因病告别人世。

艺术馆的群众也和这些编辑一样，多数人对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关心的主要是柴米油盐和业务上的问题。我和这些人在一起，觉得容易相处，闲谈时彼此都不用戒备。

刚到编辑部，领导并没有马上安排我干编辑工作。派我到德江县去采访反单干的女英雄张羽花，然后写连环画脚本；派我去施秉县采购苗族妇女的刺绣；派我去水城郊区搞农业学大寨，加起来将近两年。

真正开始搞编辑业务，大约是 1975 年秋天。由省文化局邢局长带领一批戏剧工作者，到安顺去看调演。这次调演是为全国调演选拔进京剧目。这大概是在台上的江青一伙的战略部署。

在上演的剧目中，有一个叫《小站风云》的独幕话剧，给我的印象比较好。这出戏写走资派还在走，主题思想符合上边的要求。我当时最看重的是这出戏有戏剧冲突，演员有贯串动作，意境也不错。我觉得这个戏的作者对戏剧艺术的特点领悟较深，有培养前途，就找到这位作者，一看是位二十出头的高个子年青人，在文化馆工作，叫罗运琪。交谈中，觉得小罗性格有些内向，待人温和，微笑起来显得十分谦虚。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回到贵阳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记得，我曾经将一本原苏联学者研究契诃夫剧创作的专著借给他，他读后写信告诉我，说在戏剧大师面前，他很自卑。凡是有成就的人，一般都是非常好学而又谦虚的。80 年代初，他调到我们的编辑部，后来当了省群众艺术馆的副馆长。

第二位给我印象较深的作者叫黄万机。一天，屈杰先生说，江口县一位作者写了一个花灯戏，参加剧本改稿会，最后没被选中，

作者希望我们编辑部看看，是否真的没有修改基础。屈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看了本子之后，觉得还是可以改上去。于是，就派我去江口县亲自找作者一道研究修改方案。

在江口县文化馆，我见到作者黄万机。他的年龄与我相差不多，文革前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分配到江口县文化馆辅导业余文艺创作。交谈之后，才知道他目前与馆领导关系有些紧张，日子不太好过。黄万机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书生，不会拉关系，也不会对顶头上司低三下四，每天考虑的就是剧本中的人物、情节等，当时的馆领导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部队复员军人，对知识分子左看右看不顺眼，慢慢关系自然要紧张。这方面，我也是有体会的。

记得我在江口县住了两天，就完成了任务。黄万机改好本子寄来，很快就发表了。

80年代初，省社科院招收研究生，黄万机报考被录取，命运有了转机。他毕业后，把家迁到贵阳，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贵州近代文化名人，已经出了好几本书。

第三位剧本作者叫敖行维。他当时在黔西县文化馆工作。后来调到毕节地区，现在是毕节师专的校长。我们最初接触是在黔西县，记得我们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很关心，也都很忧虑，我们琢磨不透毛主席到底想把权交给谁，也不知道文革将怎么收尾，十亿中国人将何去何从……敖行维说话很有分寸，考虑问题也很理智。在那个年代能够找到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交流一下彼此内心深处的想法，是非常不容易的。

敖行维写的剧本，内容是什么，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最后一稿是在毕节地革委招待所改好的，我不仅动嘴，而且也动手。这个本子发表之后还评了个三等奖。

在我当戏剧编辑的三四年中，还接触过一些其他剧本作者，这些作者都像罗运琪、黄万机和敖行维一样，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戏剧艺术的规律性较强，技巧性

较高，掌握了一定的规律和技巧，诸如几种结构模式，悬念、冲突、动作性，等等，对于戏剧创作相当重要，但我并不认为业余戏剧作者的成功，是完全得益于编辑的辅导。应该说，主要还是由于他们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一般来说，编辑的辅导仅仅是一种促进的作用。

其次，就我个人而言，在文革后期，我能有机会和这些业余戏剧作者接触，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拉帮结派，互相攻击，勾心斗角；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我很难适应。我从小喜欢文学艺术，喜欢钻图书馆，因此，也喜欢和有学问或搞艺术的人打交道。和这些人在一起聊文学、谈艺术，甚至谈天说地，粪土万户侯，实在是人生中一件乐事。特别在那毁灭人性、抹杀个性、剥夺了一切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年代里，与那些勤思好学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业余作者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实在是一段最难忘的日子。

二

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最特殊的年代。说它特殊，就在于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是靠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另一方面则是由文学作品的广泛影响来推动的。在这种形势下，业余文艺爱好者迅速增加，拿起笔来写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从1980年开始，《贵州演唱》更名为《苗岭》，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而我则由戏剧编辑改为小说、散文和评论编辑，与张玉华女士共同处理大量文学作品来稿。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小说编辑比戏剧编辑当起来要相对容易些。因为对戏剧编辑要求是必须掌握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而小

说编辑则只要能从大量来稿中，筛选出好稿子就行。所谓好稿子，主要是凭编辑的直觉和印象，就如同会喝酒的人，凭口感就能品尝出酒的质量一样，一篇小说来稿能不能用，有没有修改基础，基本上是凭编辑的阅读感觉来判断的。因此，任何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当时差不多都可以当小说编辑。

不过，在与业余小说作者的交谈中，我不只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他自己能写小说，所以谈起来不隔膜。”这就是说，你和小说作者对话，讨论小说创作中种种问题，你自己必须是个真正的内行。不然的话，你开口闭口就是主题、人物、情节、水分多等等套话，小说作者听了往往感到是隔靴搔痒，他表面上不反驳，也不提不同看法，因为你是编辑，掌握着作品生死大权，但他内心里却不服气，甚至瞧不起你。因此，要当个称职的小说编辑，必须对小说创作的奥秘确有研究和卓识。为达此目的，我认为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自己写出一两篇稍微像样一点的小说；二是在文学评论文章中有真知灼见。

我深知，自己在大学五年所学的知识要么太肤浅，要么已过时。要当好一个称职的文学编辑，除了再学习，几乎别无选择。不过，在我来说，这种学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量阅读报刊杂志上与自己的专业方面有关的重要文章，阅读一些有深度的人文学科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则是结合阅读和工作实际撰写文章，投稿发表。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写作并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见附录）。其中绝大部分是文艺评论文章，也有通讯、散文、人物专访、小说等文学样式。

在我写的文艺评论文章中，现在看来，绝大多数的内容是为文学新人的新作做广告。如1979年为袁昌文两个短篇小说写的《成功的心理描写》和《熟悉的陌生人》两篇评论；1980年为汤宝华、张华、严为礼写的《喜看春苗出土》一文；1981年为云南作者黎泉写的《谈黎泉的小说创作》；1982年为苗月《心的召唤》写的《爱的追

求与幻灭》；1983年为陕西作者一叶写的《才能与修养》；1984年为九篇工人习作写的《九篇“征文”作品读后琐记》等等。写这些文章的想法是，名家名作肯定有人注意，而刚刚露面的新人新作往往被人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为新人新作写点读后感式的评论文章，好处说好，鼓鼓气；不足之处善意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作者参考。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在履行一个文学编辑的职责。

其次，由于学生时代我就十分注意文艺界的讨论和批判，从所谓胡风集团材料的公布与批判，到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那场讨论，到对刘宾雁的两篇报告文学的批判……这些讨论和批判，使我认识到文学艺术问题在那个年代是何等敏感，是何等充满风险，同时，这些讨论和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我的分析和思考能力。因此，从1979年开始，在作品的真实性与艺术欣赏问题上，我就抑制不住争论的冲动，写过与李华年先生的争鸣文章；1980年又针对短篇小说《黑玫瑰》引起的争论，写了《应如何理解叶秀的悲剧》一文；1981年写了《〈降压灵〉浅议》一文，与另一篇观点不同的文章同时发在《山花》杂志上，《作品与争鸣》把这两篇观点不同的文章连同小说一起转载。1983年，《良家妇女》的作者李宽定写了短篇小说《野渡》，他见到我说，有人指责这篇小说有人性论观点，希望我看看，发表一点意见。我读了《野渡》，写了《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探求》一文，与一位笔名叫宛明的作者写的批评文章又同时发在《山花》上，《作品与争鸣》杂志再次将两篇观点不同的文章连同小说一起转载。1984年发表的《一点异议》和1985年发表的《蒙昧与开化》，实际上也应属于争鸣文章。

通读这些争鸣文章，不难看出，作者的信念不是建筑在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极左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试图根据马克思反对人的异化，以及主张人的彻底解放的理论，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再其次，回顾自己从1978年到1989年写的所有文学艺术方

面的评论文字，我认为本质上都是借题发挥的社会学文章。这是由于 80 年代是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在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中，启蒙的主题是主旋律。那时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响彻着呼唤人性反对兽性；呼唤民主与法制，反对专制和独裁；呼唤文明，反对愚昧的声音。而文艺评论则通过作品分析，所揭示的也恰恰是这一主题。在这种形势下，我那些借题发挥的文字，尽管谈不上精辟深刻，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议论并没有背离时代的主旋律，相反，有些看法即使今天看来仍没过时。

不过，尽管文学批评家或文艺理论家的桂冠十分诱人，我从执笔为文后的两三年以后，便清醒地知道我此生此世与它已经无缘了。这不仅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些才华横溢的文章我有所涉猎，而且在 80 年代陆续出现的一批年轻文艺评论家，如黄子平、南帆、李书磊、吴亮等人的文章中，我已经照出自己的肤浅、平凡和文化积累的欠缺，或者准确点讲，才气的不足。对于个人来说，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但也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1984 年，不知何故，我被调出《苗岭》编辑部，而一位杨姓的业余作者却被调进编辑部。此时，编辑部由两位妇女掌权，钟华先生在 80 年代初期去世。我被调进调研部，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尽管调研部的工作对我来说很不适合，但主任小桂很尊重我，也善于团结同志，我对离开《苗岭》编辑部丝毫不感到惋惜。大概是一年以后，当《苗岭》编辑部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张玉华女士动员我回编辑部时，我已经对艺术馆的文化环境感到失望，就是说，老文艺工作者要么去世，要么退休，而大批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纷纷调进这个单位，使这个单位的文学艺术气氛变得异乎寻常地淡薄……

就在我联系调出省群众艺术馆，到省文联或省内某高校去的时候，省文化出版厅组织一批人搞文化调查。在调查题目中，我选

了一个有关宗教方面的题目，并开始了近半年的社会调查。五篇类似调查报告的文章自认为都有一定保留价值，便全部收进书内。

在袁昌文先生的热情引荐和蒋南华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我顺利地调进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又开始了学报编辑的生活，此时我已年近 48 岁。

三

从一个单位调入另一个单位，学历、文凭、专业特长等等，这些条件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事关系。

按我的条件，当时调入文联剧协本应是没问题的。谢振东和武光瑞两位先生也为此费了不少心思。可我在某次大会上，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冒出一句，什么“文联要注意衙门作风。”在一个应该讲假话套话的场合，讲出这种话来，与其说是天真幼稚，不如说是不识时务和愚蠢。当然，没调进剧协，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没什么重要作品摆在世人面前，在文联进进出出，谁眼里会有你？除非你混个头头脑脑，人模狗样地在那里指手划脚。

另外，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也曾经想调到贵州师范大学或贵州民族学院。当时师大中文系某负责人对我发表的文章，以及我在师大的那次专题讲座，均有深刻印象。但由于我和他的对立派中某两位教师关系较好，估计他耽心我调到系里，有可能与他的对立派搞在一起，权衡再三，加上我的努力不够，事情没成。

调民院一事，都进行到去试讲的阶段，没想到民院某负责人与《苗岭》编辑部张某是亲戚，谈到我的调动一事时，张某向那位院长说，李印堂是造反派，不好领导。事情又搁浅了。不过，没去成民

院,同样也是一件好事。不然,老婆、孩子全部迁到郊区山上,对全家来说,离开繁华的市中心,远离重点中学,不说是灾难性的,也是很不明智的。

因此,我能顺利调入贵州教院,除了运气以外,应该感激的就是袁昌文和蒋南华两位先生。

有人可能要说,大学有什么好呢?的确,自 80 年代以来,工商、税务、银行、电信等等,哪个部门的待遇福利不比大学好?而且我也确实遇到过一个去省税局办刊物的机会,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因为我毕竟更重视自由思想与自由呼吸的精神环境。

我一家曾经和三十多户小市民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小市民那种卑劣我算是领教够了。我也曾经与省文化局的干部一起搞过五六年运动,那种政治爬虫的恶习和刻毒,也使我不寒而栗。说老实话,宁愿和没文化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和小市民与市侩干部同流合污。

当然,大学校园也并非世外桃源。在这里,也有矛盾和挑战,但相对来说,这里似乎更适合我的生存。

贵州教育学院是 70 年代末新创办的一所成人高校。我调入学校时,十二层的教学大楼刚刚竣工。全院教职工仅 300 人左右,学员基本上是省内各专州县的中学教师。而上课的教师,绝大部分也是从中学抽调来的,只不过年纪要大些,有本科文凭。此外,也有少部分是研究生和其他高校调来的教师。

该院学报是 1985 年创刊,只有王化伟一个年轻人专职搞编务,跑印刷,其余均是兼职。我调到教院,是学报唯一一个专职编辑,整个社科版的稿子由我一人操持审稿和编稿,最后由蒋南华院长终审。

我刚刚上任担负社科版的编辑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改论文稿子。

记得,那次我向兼主编的蒋院长汇报工作,恰好中文系某负责

人在场。他说，中文系的稿子，最好让作者自己改，不然，费力不讨好，作者还有意见。好在我在没调入教院之前已为教院学报社科版编过两期稿子，对教院教师的学术论文水平已心中有数。另外，在省文联召开的理论工作会议上，我也结识过某些高校文艺理论教师，对他们的水平也清楚。所以，这位负责人的话讲得虽然委婉，但对一个编辑来说，这等于告诉他不称职。因此，我很冲动地讲，如果一个编辑，他不能改稿子，他就不应该坐在编辑这把交椅上。他应该去当售货员，或者去烧锅炉，总之去干他能胜任的工作。其次，对中文系老师的论文，我接触了一些，有人譬如你，是可以改自己的稿子的；但有的人，不客气讲，他改不了自己的稿子，你让他改，他只能越改越糟。第三，我改的稿子，倘有不妥之处，蒋院长作为主编，他会一一审核，及时指出来的……我当着蒋院长讲的这一席话，蒋院长听了面露微笑，一言未发……

其实，这位系负责人也是一番好意。因为他在系上听某位教师讲，新来的编辑狗屁不通，乱改他的文章。这位负责人没做深入的调查，便当着蒋院长的面顺便提出来。实际上，我也心中清楚他指的是哪篇文章。

现在看来，我在处理这位教师的稿子程序上的确有不妥之处。既然发现稿子需要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应该找作者面谈，把编辑部审稿意见转告给作者，供作者修改时参考。多年文学编辑形成的习惯是，对多数采用稿件往往是编辑捉刀代笔，大删大砍。高校学报编辑面对的往往是本院教职工的来稿，在处理方式方法上，与文学期刊编辑应有所不同。

第二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和中文系两位青年教师的学术争鸣。

在1987年，编辑部收到两位作者合作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题目叫《中苏现代军事文学的比较与思考》。文章写得条理很清楚，观念也较新，只是在某些史料掌握与看法上存在一些问题。经

编辑部研究，并亲自登门与作者磋商，征得作者的同意，由我执笔撰写了一篇题为《文学研究与科学态度》的商榷文章，同时发表在学报上。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至少是在本院中文系产生很大影响。两篇文章说明，学报编辑部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对教师的学术论文的鉴定与审核，是严肃认真的，没有玩忽职守和掉以轻心。其次，在编者按中，学报提倡思想解放与大胆思考，同时也鼓励商榷争鸣，以活跃学术空气。这就表明编辑部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庸俗作风划清了界限。文章发表后，两位年青作者都非常虚心，他们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都陆续取得一定成绩，先后晋升为副教授。

第三件是关于审稿制度的建立。

文学期刊的来稿一般均由编辑审定。高校学报的来稿一般涉及的专业范围比较广泛，仅就人文学科来看，内容就包括文、史、哲、经、教、法、外语等，因此，审稿定稿是学报编辑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就我省几家高校学报文科版的稿子处理情况来看，各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有的是基本由编辑审定，个别专业性太强、编辑拿不准的稿子，再请专家审；有的是几位学报编辑分兵把关，各管一两个专业的来稿审定与编辑加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最初，我采取编辑能审的稿子由编辑审，编辑审不了的则请专家审。但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别职称较高的人不经编辑部授权或委托，便将别人送到他手头的稿子，写好审稿意见，交到编辑部。而这种审稿意见往往不够客观和公正。蒋院长在终审时，为了确保学报的质量，还是秉公办事，不循私情，“枪毙”了好几篇这种稿子。我当时已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兼社科版副主编，面对这种现象，觉得有必要制定一个审稿条例，规定内稿和外稿一律由编辑受理登记，然后由编辑选择同行专家审稿，并实行双向保密。这一条例经主编蒋院长签字，然后打印发各系，结果绝大多数

教师对此均表示支持和理解。这对于减少人情稿和关系稿，保证用稿质量，防止编辑部的庸俗和腐败作风的发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要完全杜绝人情稿与关系稿，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是办不到的。特别是我院社科版自 1987 年由内部刊物批准公开发行以后，为了评职称，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关系，把稿子转到编辑手中，要求照顾。面对这种压力，我们要采取的办法是：够质量的，优先采用；有修改基础的，千方百计协助作者改好，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没有修改基础的，从选题到内容，帮助作者另起炉灶，有时甚至请专家手把手指导作者写论文，直到写出一篇勉强能过关的稿子。这就是我们对待人情稿和关系稿的处理办法。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第四，是关于编委会的改组。

学报 1985 年创刊时，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编委会，成员有十多人，其中有文科各系负责人，院党委、宣传部等部门都有人参加。好处是热闹，吸引大家关心。但弊端是开会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为有些成员对学术研究既隔膜，又没什么兴趣。这种编委会机构庞大，却不利于编辑部的有效运作。有鉴于此，比我早一些调进学院的蒋院长与我一起重新搞了个比较精悍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总共五人，其中除主编和副主编外，其余两位均是在学术研究上很有成就的学者型教师。在专业结构上，也注意到文科各系尽量有一个学术带头人参加。每期稿子编好经编委、副主编及主编传阅，分别将自己的审稿意见写在审稿单上，最后召开定稿会，大家就个别有不同看法的稿子进行讨论。这种由真正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其特点是少而精，每个编委均热心于学术事业。只有这样，编委会才不会徒具形式。实践证明，无论要不要编委会，要办好学术期刊，必须依靠真正热心于学术事业的专家学者，仅靠几个编辑往往是不够的。